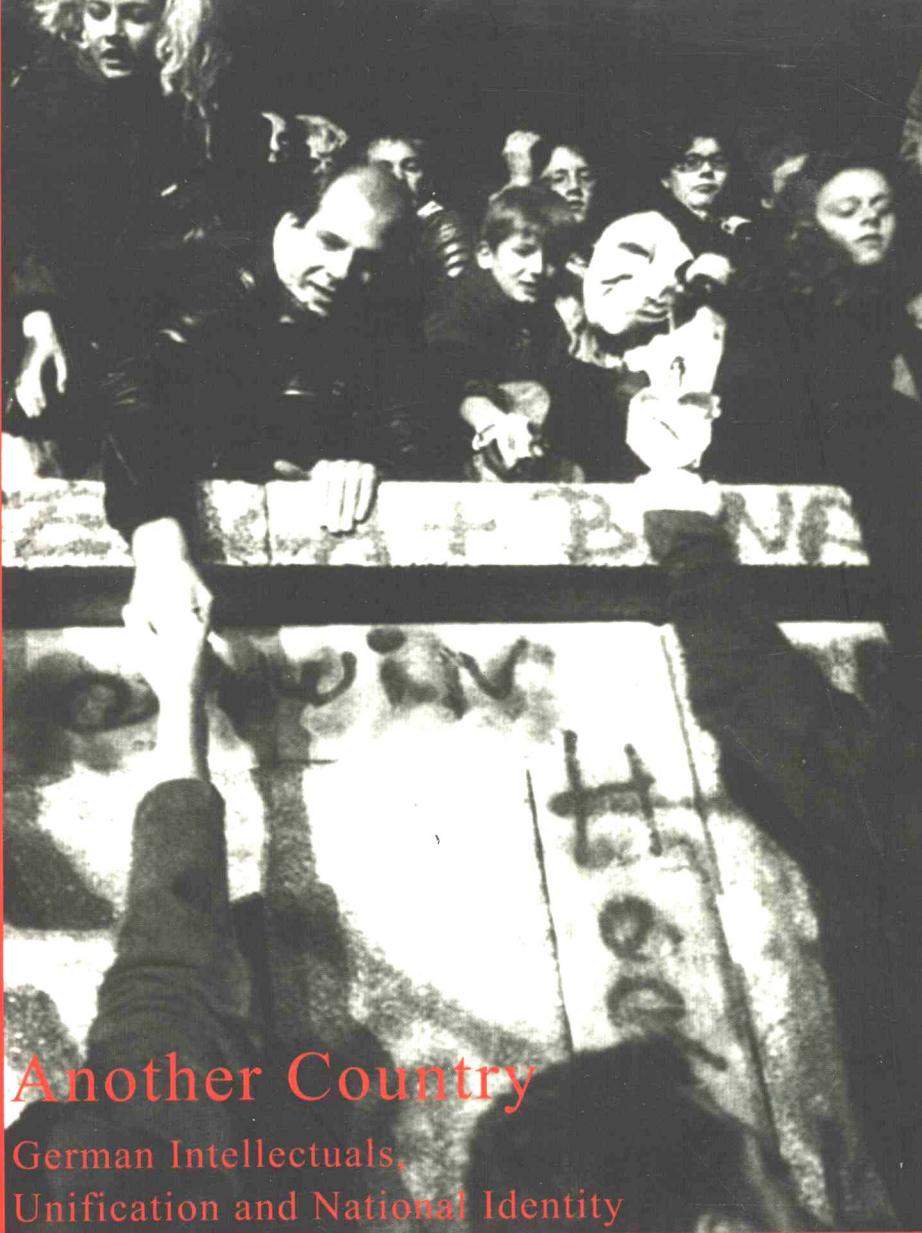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Another Country

German Intellectuals,
Unifi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另一个国度

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

[德] 扬-维尔纳·米勒 著 马俊 谢青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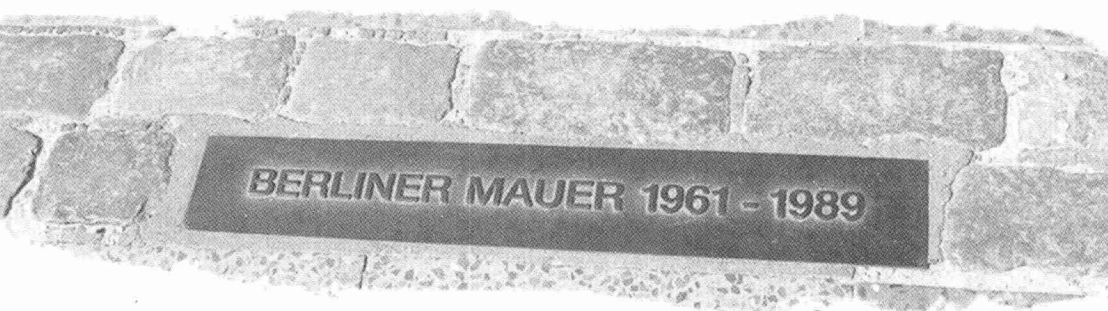
Jan-Werner Müller

另一个国度

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

Another Country

German Intellectuals,
Unifi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BERLINER MAUER 1961 - 1989

[德] 扬-维尔纳·米勒 著
Jan-Werner Müller

马俊 谢青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 / (德)米勒著;

马俊、谢青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5

ISBN 978-7-80225-477-0

I.另... II.①米...②马...③谢... III.德国问题—研究 IV.D75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52956 号

Another Country:

German Intellectuals, Unifi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by Jan-Werner Müller

Copyright © 2000 by Yale Universit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另一个国度:德国知识分子、两德统一及民族认同

(德)扬-维尔纳·米勒 / 著 马俊、谢青 / 译

责任编辑:许 彬

装帧设计:林 涛 秦 巍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 × 1300 1/32

印 张: 12.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一版 200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5 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477-0

定 价: 44.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是啊,只盼这些人和别的人一样,
只盼这是一个完全平常的、另一个国度,
而不是这个夜与雾的国度,
挤满了灵魂出壳的住户,
既不知自己是谁,也不愿知道,
被抛入这片国土,
又要逃离这片国土,
流离失所一直到坟墓:

只盼是别样的,只盼它还有救,
只盼这里有忠告和慰藉,
只盼它不是这个荒废的、封了嘴的敌人之国度!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国家语言》,1960*

* ja wären' s leute wie andere leute,
wäres ein ganz gewöhnliches, ein andres
als dieses nacht - und nebelland,
Von abwesenden überfüllt,
die wer sie sind nicht wissen noch wissen wollen,
die in dieses land geraten sind
auf der flucht vor diesem land
und werden flüchtig sein bis zur grube:
wärs anders, wär ihm zu helfen,
wäre rat und genugtuung hier,
wäre es nicht dieses brache, mundtote feindesland!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Landessprache*, 1960

致谢

我感谢埃丽卡·本纳(Erica Benner)、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玛丽·富尔布鲁克(Mary Fulbrook)、苏迪尔·哈扎雷辛(Sudhir Hazareesing)、安德列亚斯·许森(Andreas Huyssen)、托尼·裘特(Tony Judt)、理查德·克默林斯(Richard Kämmerlings)、卡伦·李德(Karen Leeder)、查尔斯·S. 迈尔(Charles S. Maier)、杰夫·奥利克(Jeff Olick)和彼得·施奈德(Peter Schneider)所给予我的有用忠告和参与谈论德国(über Deutschland reden)的机会。G. A. 柯亨(G. A. Cohen)、迈克尔·弗里登(Michael Freeden)、帕特里克·加维甘(Patrick Gavigan)、罗杰·格里芬(Roger Griffin)、伊姆克·瓦伦丁(Imke Valentien)和塞西莉亚·沃尔什(Cecelia Walsh)阅读了全部或部分手稿,且提出了极其有用的建议。帕特里克·科尔(Patrick Cohr)对手稿通读了几遍,提出广泛而中肯的批评。尤其感谢安迪·拉宾巴赫(Andy Rabinbach)和汉斯·蒙森(Hans Mommsen)在一个关键阶段有力地介入我的研究,促使它的论证转向更历史化的方向。我深深地感激朱丽安娜·隆德(Giuliana Lund)所给予我的知识上和情感上的教育。再次感谢伊姆克·瓦伦丁多年来一直参与这个研究项目。

感谢 ESRC 和德意志民族研究基金(Studienstiftung des Deutschen Volkes)的经费支持,感谢牛津大学全灵学院提供经费支持,并且在本

研究项目最后两年为我提供研究场所。第六、七、八章的一些内容曾分别发表于《德国研究评论》(German Studies Review)2000年5月号、《德国政治》(German Politics)1999年12月号和《新德国批评》(New German Critique)1997年冬等学术刊物。感谢各刊物的编者允许我在本书中使用这些内容。还要感谢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亚当·弗罗伊登海姆(Adam Freudenheim)和约翰·尼科尔(John Nicoll)自始至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

我感到荣幸,向我的博士导师彼得·普尔策(Peter Pulzer)致谢,一个非常不同的“怀疑一代”的一员,既感谢他对本书所做的评论也感谢他的敏锐。我总是很感谢我的祖母在经济和情感上的支持。最后,感谢我的母亲带我逃离了德国的学术环境(尽管并非脱离了德国认同的问题),让我得以在另一个国家写书研究德国——也许是好事,也许不是。

本书便是献给她的。



原作者的翻译及术语说明

除非特别说明,所有德文都是由我本人翻译的。有些概念在德文话语当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便以德文来书写它们,且根据上下文脉附上尽可能确切的翻译。

“再统一”一词我用来指称 1989 年以前的政治目标,因为那时西德的官方政策仍然以承认 1937 年帝国的“认同理论”为依据。从 1989 年之后,对 1990 年 10 月 3 日的事件,准确的称呼应该是“统一”,而且这个称呼在如今的德国也已经取得了主流地位。

我对“东德”和“民主德国”的使用是可以互换的,但是我只用“联邦共和国”来指称西德,因为“联邦德国”一词是民主德国的官方用语之一(也被一些西德左翼派系所使用)并且至今仍然含有贬义。

目 录

致谢	1
原作者的翻译及术语说明	1
导论	1
第一章 1945 年以来西德的民族、国家和知识分子:历史的公共用途	25
第二章 君特·格拉斯及其批评者:奥斯威辛的形而上学	81
第三章 尤尔根·哈贝马斯和宪法论战:“德国马克民族主义”对阵宪法爱国主义	115
第四章 忧郁、乌托邦与和解:左翼和自由派对统一的回应	154
第五章 马丁·瓦尔泽:德国式感伤和对德国的观点	193
第六章 卡尔·海因茨·博雷尔:重振浪漫主义和国家的审美化	227
第七章 从民族认同到民族利益:解剖德国新右派	255
第八章 为政治事物或记忆的私人化做准备:德国知识分子遭遇“柏林共和国”	292
结论	345
译名对照表	370

导 论

本书旨在分析西德知识分子对于两德统一的反应,分析他们自从1989年以来所参与的若干次民族认同论争。普遍认为,统一把德国知识界掷入一个危机与扰攘的阶段,而这个阶段至今未能克服。绿党政治家安特耶·福尔默(Antje Vollmer)描述1993年的形势时说:“欧洲大震荡过去四年了……但在精神界仍然电闪雷鸣、众声喧哗。”〔1〕这句话即使放在统一十年之际也还是一语中的。左派发觉,自己同一般所谓“民族国家失而复得”的说法难以合拍,而对1989年事件所造成的民族归属和公民身份却又找不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概念表述。其中一些知识分子改弦易辙,采取了有民族主义嫌疑的路线,于是其他仍然信守战后西德自由左派共识的知识分子把那些人斥为叛徒、革出山门。〔2〕另一阵中,保守派史学家依据历史上的领土归属辩护统一后的“新”德国,呼吁民族的自我肯定,却也有一群较年轻的知识分

〔1〕 Antje Vollmer, “Woher kommt diese Wut?” (《此怒从何来?》), 载于 *Der Spiegel*, 1993年9月15日。

〔2〕 有嫌疑的“新民族主义者”, 例如 Botho Strauß (《Anschwellender Bocksgesang》[《日渐响亮的山羊歌》]), 载于 *Der Spiegel*, 1993年2月8日),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Ausblicke auf den Bürgerkrieg》[《内战之展望》]), 载于 *Der Spiegel*, 1993年6月21日) 和 Martin Walser (《Deutsche Sorgen》[《德意志之忧》]), 载于 *Der Spiegel*, 1993年6月28日)。

子,抓住统一这个契机,要建立一个“民主的新右派”。而就在知识分子彼此之间为1989年之意义和统一后的国家性质争论不休之际,几乎他们所有人至少都同意:知识分子这一角色本身出问题了。

在关于统一的论战之中以及之后,德国知识分子都调用了哪些民族归属的概念表述呢?他们如何来看待民族、国家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呢?这三者分别同德国的过去是个什么关系,它们同那个谰语般的概念“克服过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又是个什么关系呢?〔1〕在对统一的回应里,究竟有没有什么思想上的真正新发展呢?最后,各方都雄辩滔滔地谈论那个似乎完全固化了的概念“民族认同”,在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民族心理学”呢?——外国观察者对此都疑惑不解。“民族认同”这些新概念究竟是不是“民族利益”的一套新说法呢?正如《华盛顿邮报》前驻德通讯员马克·费舍尔(Marc Fisher)所指出的,“这场关于认同和目标的讨论的内容变化多端。论战逐渐演变成一场阴沉沉的、极端理性化的讨论,其话题又是那样抽象,难以想象它能有什么结论”。〔2〕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就曾说过,自己已经厌烦了“毫无教益的虚假论战”和“就认同追求和认同危机所做的心理学—社会学分析”。〔3〕甚至连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统一后德国性质论战一大主力,都以

〔1〕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这个概念有很重的官僚语气,也隐含做个了断的渴望,它本来是同1950年代西德对待纳粹时代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但是我把它用作一个代号,来统摄德国人“处理过去”的那种心态,在本书倒数第二章,我会以更多篇幅来讨论“克服过去”的程式化和职业化的问题。

〔2〕 Marc Fisher, *After the Wall: Germany, Germans and the Burdens of History* (《后柏林墙时代:德国、德国人及其历史重负》),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p. 71。

〔3〕 达伦多夫爵士为 *Woodstock Road Editorial*, St Antony's College (圣安东尼学院《伍德斯多克路社论》)所做访谈录,1994年11月(未发表); Ralf Dahrendorf, “Eine deutsche Identität”(《德国认同》), 载于 *Merkur*, 第44号(1990), pp. 231—235。

“鬼影幢幢”来形容这些“认同论争”。〔1〕还有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Hans Magnus Enzensberger),声言“集体精神丝毫不值一提”,“老是把民族性放到显微镜下去检视”令他越来越厌烦。而在柏林墙倒塌前四分之一世纪的1964年,只有这位恩岑斯贝格尔一个人曾在“我是德国人吗?”一文中表示过希望能超越老生常谈的认同问题——这正好表明“民族认同”问题的持久性,表明德国知识分子长时期来恰恰无力超越此类民族问题。〔2〕然而无论当初或现在,外国和本国的观察者一致同意:“说到底是有个真实的问题溃烂了,开始是羞耻心和负罪感,最后恶化成一场政治、社会偏瘫,威胁到欧洲的未来。”〔3〕而德国知识分子不得不说的话会对这些真实问题发生真实的效果——德国知识分子和公众似乎相信这一点。

如果要分析西德知识分子对统一的反应,分析统一给公共话语骤然造成的变化,我们马上就会遇到一连串陷阱:怎样来处理一个继续在发展和增长的话语呢?这场论战的参加者有着高度的自觉意识,试图在战略上发挥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争取通常所谓“文化领导权”,对这样一场论战如何才能保持一定的距离?此论战具有鲜明的自涉性,这既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特点,也是对观察者的一个挑战。双方常常发表尖锐的长篇大论,“左是什么”、“右是什么”,这每每是不点名地说某位“右派人士”——更多是某位“左派人士”——如何如何“意识形态化”,或是触犯了哪条“禁忌”。在此类思想交锋之际,思想兼政治对手往往得背上一些最坏的性质,而且据说这都是“典型德国式”的

〔1〕 Jürgen Habermas,“Die zweite Lebenslüge der Bundesrepublik: Wir sind wieder ‘normal’ geworden”(《联邦共和国的第二番终生自欺:我们重新变“正常”了》),载于 *Die Zeit*,1992年12月11日。

〔2〕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Am I a German?”(《我是德国人吗?》),载于 *Encounter*,第4号(1964),pp. 16—18。

〔3〕 Fisher, *After the Wall*, p. 71.

劣根性：新教徒式的内向、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极端的倾向、权力保护下的内心世界（*machtgeschützte Innerlichkeit*，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创造的一个表达）、迷恋政治上的终生自欺（*Lebenslügen*）以及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

爱扣帽子和人身攻击，这似乎是德国人论战时的癖好，但学术研究必须高于这个水平，它要求的是对此进行解释。比方说，即便对左派的某些攻击打在了点子上，这些攻击本身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左派会做出后来那些反应。但是有一点很奇怪，统一论战的德国观察者没有一位采取日耳曼学里最通行的政治论证研究法——历史化方法。换言之，人们从来没有认真地努力，去检视统一之前知识分子立场的发展历程，去理解过去的立场怎样影响他们在柏林墙倒塌之后的态度。但是知识分子迷局的真正关键恰恰在这里。比如，为什么同一群作家和思想家，在 1960 年代初反对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及其融联邦共和国于西方阵营的政策时，是以再统一的名义反对的，却当自诩为阿登纳“政治孙子”的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1990 年真的承诺要促成两德统一时，又反对科尔。显然，要解释知识分子的反应，第一个也是基本的步骤是恰如其分地、不断章取义地叙述：知识分子在某些时刻发表了哪些言论，他们是否改变了观点——如果改变了，又是为什么。现有的一些论著本身都没能跳出论战之外，作者都带进了自身的立场，所以甚至连准确地叙述论战都做不到。一切评价必须以多面化的历史分析为基础。不过，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又该以什么标准来进行评价呢？

以德国知识分子和统一为题材的多数论著都以某种方式推进了一个论点——“知识分子的失败”。〔1〕对知识分子的忠告，一是他们

〔1〕 此一失败，最雄辩有力的诊断来自 Andreas Huyssen，“After the Wall: The Failure of German Intellectuals”（《后柏林墙时代：德国知识分子的失败》），载于 *New German Critique*，第 52 号（1991），pp. 109—143。一篇论战性的、肤浅的讨论来自 Paul Noack，*Deutschland, deine Intellektuellen*（《德国及其知识分子》），Berlin: Ullstein, 1991。

对1990年的发展批判过度,没有和“人民”步调一致,二是他们一般而言自我批判得不够。尽管如此,仅仅斥责知识分子“过度批判”是无谓的,只是一种论战伎俩。毕竟,保持一定距离,采取一个节制、负责任的批判立场,这恰恰是知识分子(自我设定)的使命。〔1〕但是“有批判性”当然不是一件直来直去的事情。为了回应右翼的“失败”指控,“思想好”(bien-pensant)的左派发展出了一种自我开脱的理论——有人发动系统战役,试图让批判性的声音闭嘴——在此过程中进一步为“保持批判性”做辩护,而我将在下文证明,这些辩护本身常常是非批判的,甚至有些是一攻即破的。哀叹德国知识分子的和他们自我哀叹的声音,甚至对这些哀叹的哀叹,已经够多的了,我无意再增加一声哀叹于其中。

然则问题依旧存在:该如何来分析知识分子的回应,该如何来判断这些回应在某种意义上是恰当的或不恰当的?作为西德作家之政治介入的一位敏锐观察者,司徒亚特·帕克斯(Stuart Parkes)对这个问题有着清楚的意识。他设问:“对于这场经常陷入白热化的论战,是否存在某种客观的裁判标准呢?”继而作答说:“最有希望的途径也许是,把它同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联系起来考虑,看一看这个角色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然而麻烦的是,那个角色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共识……”〔2〕我们也许还可以补充一点:在所有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之中,甚至排除了那些有心同“文人们”(clerics)算

〔1〕关于“负责任”(“responsibility”)这个概念的一些深刻见解,见Ian Maclean等编,《The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of Intellectuals》(《知识分子的政治责任》),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我希望,我自己的知识分子之责任概念随着本书的展开会变得逐渐清晰起来——但愿这种方式效果好过一开始就给出一个知识分子之使命的抽象范型。

〔2〕Stuart Parkes,“Introduction”(《引言》),载于Arthur Williams等编,《German Literature at a Time of Change 1989—1991》(《变动时代中的德国文学:1989—1991》),Bern:Peter Lang,1991,pp. 1—20;此处引自p. 9。

旧账的例子之后,〔1〕似乎仍看不到关于他们适当角色的普遍共识。事实上,在统一进程中以及统一之后,公共领域知识分子这一角色本身受到了挑战,在文艺、学术和政治的营垒之间,战火总是一触即发。

我以为,分析统一论战最有效的办法是,首先切近地检视德国作家学者们在对统一做出回应时所调用的思想资源。对于知识分子们所使用的思维模式和概念,尊重历史地去回溯其早期阶段,是至今为止仍付阙如的一种努力。〔2〕唯有通过这种“回溯”,才能看透德国政治认同论战的阴晴变幻。除了分析个别知识分子的轨迹之外,我试图去考察若干核心概念的含义是如何随时间而改变的,这些几乎令所有知识分子都不得不加以拷问的概念尤其包括民族这个观念。政治上使用的概念必然是含糊和多义的。它们只有置入由其他概念所组成的上下文中才能获得确定的含义,〔3〕而知识分子恰恰是要把它们置入新的上下文,来重新规定其含义。我既要考察知识分子在德国认同论战中所共同使用的概念语言,也要考察他们所做的重新定义。我将在结论中分析一些概念,它们在德国论战中既占有核心地位又“受到根本的质疑”——但是它们也制约着论战,依我之见,常常导致论战徒劳无功。〔4〕

要避免人云亦云的陷阱,避免重复右派堆砌起来的“知识分子失败论”之谴责,并不是说就不能对知识分子所使用的论证和概念做一

〔1〕 Julien Benda, *La Trahison des Clercs* (《文人无行》), Paris: Grasset, 1927。英译本: *The Treason of the Intellectuals*, Richard Aldington 译, New York: W. W. Norton, 1969。

〔2〕 讨论这个题目的所有著作都只关注现在,毫不追溯历史。例如 Wolfgang Jäger 和 Ingeborg Villinger, *Die Intellektuellen und die deutsche Einheit* (《知识分子和德国统一》), Freiburg: Rombach, 1997。

〔3〕 Michael Freeden, *Ideologies and Political Theory: A Conceptual Approach* (《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概念学方法》),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 W. B. Gallie,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受到根本质疑的概念》), 载于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第 56 号 (1955—1956), pp. 167—198。

个评价。毕竟,这些知识分子是在做论证,而且希望人们把它看作论证——如果不跟他们论理则是错误的,因为此处存在着越出德国背景的一流理论课题:关于民族认同和在所谓“后民族时代”的替代性归属形式的问题、调和民族主义与共和主义的方式、公民身份的本质和属性以及“建立”共和的必要性。当然,还有就是知识分子本身的角色问题——他们是否真的能够像他们经常自诩地那样做一个“民主公民”的榜样?还是说在一个民主的、后极权的社会中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自身包含着悖论?在这个意义上,挑战“两德统一和知识分子对它的回应”这个课题,必然也是一个应用政治理论的研究。

所以必须仔细考察这些论证的融贯性、一致性以及它们在道德上、政治上的实际影响。一致性既是指内在逻辑上的一致性,也是指时间上的前后一致性,例如在两德统一之前和之后的主张是否一致。然而我不会把时间上的一致性上纲上线,当成一个考验知识分子的道德门槛,毕竟1980年代和1960年代的联邦共和国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看到某些发人深省的内在矛盾,可以看到某些知识分子的主张,同他们在柏林墙倒塌前夕的主张不一致。极其重要的是,可以比照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来衡量他们的行为。毕竟,知识分子都有种倾向,就是把自身的角色作为优先关注点之一,下列每一形象,都在某一方面表现了有关他们理想角色的主张——持怀疑态度的公民、公共领域的批判者、表达自身感受的纯粹个人或是为“文化领导权”而战的知识分子党员。更为重要的是,知识分子的批评者在衡量他们的时候,常常是不仅比照他们的自我认识,而且也比照一个典范性的西德知识分子角色——民主公民。据说,知识分子们过去扮演了这个角色而现在却放弃了它。那么,这个常常被定位于1960年代晚期和1970年代早期的昔日角色是不是一个被理想化的、甚至虚幻的角色呢?于是,对知识分子在联邦共和国时代所实际扮演的角色做一个审慎的**历史**叙述,又一次成为评判这些主张的关键。

几代德国知识分子：从精神贵族到民主公民？

如果单单聚焦于个别的论证和概念，就可能会忽视另外一个方面，而这个方面对看清论战来说意义重大，对历史地解释论战十分关键，尤其是在德国背景之下更是如此。这个方面就是代际冲突。一般说来，以所谓一代一代人为焦点的流行做法常常既有解释过度，又有解释不足的弊病，因为它把一代人体验单一化，把政治态度简单地化约为某个年龄层的特定体验。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代际冲突在德国政治中扮演了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角色——从20世纪早期的青年运动到1950年代的“怀疑一代”，到“1968年一代”，到新近形成的“1989年人”再到社会学家最近提出的“柏林一代”。〔1〕尤其是，这些代际冲突的主人公们一再指出，以他们的同龄人的体验来定义政治事件具有核心意义，并且也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共性甚至跨越了政治上的分歧——没有理由对这些自我描述草率地加以排斥。〔2〕这里的一代一代人是由特定有力政治事件（及其参与）而得到定义的，可以简洁地把他们标识为一个一个“政治代”。〔3〕在统一论战的背景下，居于中心地位的是所谓“高炮连助手的一代”（Flakhelfergeneration，在二战末期从学校里抽调来辅助操纵防空高炮的青少年）及其周围同龄

〔1〕 Heinz Bude, “Generation Berlin: In Vorbereitung auf die neue Republik”（《柏林一代：为新共和国做准备》），载于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1998年6月18日。

〔2〕 为什么“代”的意义在德国如此重要？这里提一个解释以供探讨：德国社会有个特征，政治上不断有崛起者，上层社会的流动性很大，阶级和阶层在这样的社会里不甚重要，与保有贵族或上流社会（haute bourgeoisie）的其他国家恰成对照。当然，我并不是主张阶级或阶层在德国无足轻重。

〔3〕 Karl Mannheim, “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代的问题》），载于 *From Karl Mannheim*（《卡尔·曼海姆选集》），Kurt H. Wolff 编，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1993, pp. 351—398。我省略了更为复杂的关系：“代的阶层”（“generation status”）、“作为现实的代”（“generation as actuality”）和“代的单位”（“generation unit”）。

人的决定性精神体验。〔1〕但是给这一整个群体贴上“希特勒青年一代”的标签,就像有时人们所暗示的那样,则可能是过于简单化了。在这一代同龄人中,应当进一步区分出三个群体:在1927年或之前出生者——他们有可能成为防卫军士兵甚至少尉,出生于1927和1928年之间者——他们没有被征调到真正的部队,但是仍以操纵高炮而参与了战争,以及1929年出生者,他们没有参加防空单位,但以其他形式参与了第三帝国的防卫。〔2〕在1930年或之后出生的那些人则成了“清白的几代”(weiße Jahrgänge),大部分被看作是完全无辜的。〔3〕属于第一个群体(参加过战争者)的有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生于1927年)、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1927)和库尔特·松特海默尔(Kurt Sontheimer,1928);属于第二个群体(“清白”者)的有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拉尔夫·达伦多夫(1929)和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1929)。然后就是稍稍年轻一点的一群知识分子,生于1932年及之后,他们仍然保有对战争和纳粹统治下之童年的回忆。正如人们所经常指出的那样:仅仅是早几个月晚几个月出生就判别了有罪无罪,这个事实在1920年代后期、193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中间,导致了一种对时机之偶然性乃至宿命性的敏锐意识。〔4〕

〔1〕 Heinz Bude, *Deutsche Karrieren; Lebenskonstruktionen sozialer Aufsteiger aus der Flakhelfer-Generation* (《德国事业:出身于“高炮连助手一代”的社会新贵们的生活历程》),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92, 和 *Bilanz der Nachfolge; Die Bundesrepublik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后继者清单:联邦德国和民族社会主义》), Frankfurt/Main: Suhrkamp, 1992。

〔2〕 Rolf Schörken, *Jugend 1945: Politisches Denken und Lebensgeschichte* (《1945年青年:政治思想和生活史》), Frankfurt/Main: Fischer, 1994。一位政治科学家的动人叙述,见 Martin Greiffenhagen, *Jahrgang 1928: Aus einem unruhigen Leben* (《1928年人:不安此生》), Munich: Piper, 1988。

〔3〕 Viggo Graf Blücher, *Die Generation der Unbefangenen* (《无束缚的一代》), Düsseldorf: Diederich, 1967。

〔4〕 Bude, *Bilanz der Nachfolge*, p. 81。